



抗日戰爭之精神動員

—淞滬戰役

撰稿／祁志榮*

壹、前言

對日抗戰起自民國26年的盧溝橋事變，當年我國尚未完全現代化，要面對一個已經完成現代化的強敵，無論是對其人民與政府而言，都是一項大膽的賭注，而賭注的代價將是一個國家的存亡。當年以蔣委員長為核心的國民政府，面對強敵侵凌，儘管容忍再三，卻無法消弭侵略者的野心。在手頭上僅有的一部份現代化武力，是否要孤注一擲？考驗著領導者的智慧。本研究的重點在以精神動員的角度，探索抗日戰爭期間，淞滬戰役的意義。這場近百萬人參與的戰役，對雙方都造成了重大的損失，特別是當年的中華民國，中央軍精銳部隊全數

投入，數年的積累幾乎完全殆盡。這種損失到底值不值得？有沒有在犧牲後取得決定性的致勝因素？此外本文的研究途徑以歷史為主，而所選取的歷史資料，盡量以第一手的當事人回憶為基礎，另以其他資料參證之，確保研究內容的信度與校度。由於時間與資料學養的限制，研究內容或有疏漏與錯誤之處，個人亦將虛心檢討，以作為未來改進的基礎。

貳、淞滬戰役概述

一、戰前概要

民國26年7月7日晚間2340時¹，日軍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在永定河附近實行夜間演習，此時聽到幾聲「槍響」，日軍

* 本文作者現為後備動員管理學校中校教官，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1 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確切時間，根據當年幾位親歷其事者的回憶皆有不同，對照《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內容，還原當年是時如下：日軍1聯隊3大隊8分隊於7月7日下午1930開始演習，2240時演習部隊遭龍王廟附近不明人士射擊，隨即集合部隊，此時進行人員清查，發現新兵志村菊次郎未歸隊（時間大約2300）但約20分鐘後（2320），失蹤士兵歸建，人員到齊。而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卻未將士兵歸隊的情事及時回報，直到8日清晨0200時才向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回報。在清查人數發現缺員的同時，一木清直已向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回報，此時約為2330。而我冀察政務委員會林耕宇專員則於7日2340時接到日軍要求進城尋找失蹤士兵。綜合上述，盧溝橋日軍失蹤是偶發事件，且已歸隊；而日軍迅速增兵，則是蓄意而為，強起釁端。

中隊長清水於搜索之後集合部隊，發現新兵志村菊次郎失蹤，認為係被盧溝橋駐軍或該處土匪所害，應准日軍進入河北省宛平縣城內搜查，宛平縣城為國軍29軍37師110旅219團第3營的駐地，當時河北省行政督察專員暨宛平縣長王冷齋，立即通知駐軍金振中營長對城防切實戒備，並令警察保安隊代為搜尋。²冀察綏靖公署與金營長的通電甫畢，日軍的砲火立即到達，將該營營舍炸倒6間，官兵數人傷亡。³同時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也向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嚴正指出：「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礙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致起誤會，惟姑念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後，令該地軍警代為尋覓，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⁴但日本松井機關長並不滿意，嗣後於7月8日0200冀察談判代表及松井獲報失蹤日軍已歸隊，而松井卻要求調查該兵失蹤原因。王冷齋向松井表示失蹤原因只需詢問該兵即可，但為了周到起見，由雙方派遣代表調查亦可。隨即指派綏署交通副處長周永業、專門委員林耕宇、日本顧問櫻井及日本通譯齋藤等五人組成臨時調查組，前往宛平縣。⁵日軍聯隊長牟田口與王林二人談判未果，臨時調查組便前往宛平城。此時宛平城為已有日軍300餘人展開攻擊隊

形，日軍特務機關部輔佐官森田徹中佐與調查小組共赴宛平城內，一行人於專署會客室繼續談判。0708 0600時29軍37師219團吉星文團長登上縣城瞭望敵情，隨後立即召集各級主官提示：「日軍今天動作與往日不同，身上沒有帶背包，腳下沒有穿皮鞋，必然有所行動！」⁶話沒說完，日軍就已開始攻擊。而當年中央與北平當局的電文中亦可瞭解嚴重性：

嚴寬（國府軍政部簡任參事，何應欽將軍之幕僚）致何應欽電⁷：

特急。重慶。軍政部部长何鈞鑒請轉委員長蔣：○密。日軍在盧溝橋實彈演習，示威多日。陽夜，日軍強迫入市，遂與我馮師（第37師，師長馮治安）駐盧一營發生衝突，現正對峙中。職寬叩。庚晨。印

另外第29軍軍長宋哲元在呈委員長電文中，以堅定的口吻表達：「華北部隊守土有責，自當努力應付當前現況，職決遵照委座「不喪權，不失土」之意旨，誓與周旋。」⁸我最高統帥當局盱衡全般局勢，認定全民抗戰的時機已然成熟，因此蔣委員長於民國26（1937）年7月17日在江西廬山發表了名為「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也就是俗稱的「廬山宣言」，其中提到了「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

2 王冷齋，〈七七回憶錄〉，《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第32卷第1期，），頁28。

3 金振中口述，郭景興整理，〈七七事變親歷者口述實錄〉，《前線》，（北京：2007年第7期，2007年7月），頁60。

4 秦德純，〈七七盧溝橋事變經過〉，《傳記文學》，（台北：第1卷第1期，1962年），頁26。

5 王冷齋，〈七七回憶錄〉，頁28。

6 吉星文，〈盧溝橋保衛戰回憶錄〉，《中國一週》（台北：第129期，），頁7。

7 傳記文學資料室，〈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中央與華北軍政負責人往返密電選（上）〉，《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第53卷第2期，），頁96。

8 傳記文學資料室，〈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中央與華北軍政負責人往返密電選（上）〉，頁98。



牲。」但同時在宣言中設定了四個指標，來界定何為最後關頭，那就是：

-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
-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合不合法之改變。
-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行政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 (四)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⁹

以上的四點，是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第一次針對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希望日本軍閥不要得寸進尺。同時在國軍方面，備戰的氣氛日漸提高。中央電令當時中央軍第5軍之87、88、36等3個師進駐上海。而第5軍軍長張治中早於民國25年2月，便已依據命令對上海地區日軍進行情報蒐集。由於128停戰協議規定：「後上海五十基羅米突（公里）內不能駐中國國軍」的限制，因此軍職人員必須改裝進行。時任88師參謀長張柏亭的回憶：「統帥部於華北局勢緊張之際，以『軍校野營辦事處』名義，在蘇州獅子林設置前進指揮所，經常召集各級部隊及幕僚，研討策劃對松滬方面的作戰準備。各部隊官兵更是鬥智昂揚，士氣振奮，在駐地枕戈待命，準備隨時出動殺敵。」¹⁰主其事的是當時第五軍軍長張治中，軍校野營辦事

處的主要宗旨有二，一為國防工程；一為民眾組訓。¹¹同時在參謀本部，白崇禧被任命為副參謀總長，他回憶當時的情形：「我最高當局知日為貫徹其大陸政策，必不會停止侵華行動，於南京召集全國將領開會，表示決心抗戰，各將領歸去後，秣馬厲兵動員調遣待命抗敵。」¹²從中央到地方，到處瀰漫著抗戰備戰的氣氛。

根據上海兵誌概要，京滬地域位於華北大平原南緣，扼東南丘陵北麓，當長江、淮河下游，為華東政治、經濟、文化中樞。江淮地區為一河流川渠交錯之地區，此類河渠平均河幅一至兩百公尺不等，通常不能徒涉，京滬路以南濱湖諸縣，及長江兩岸自揚中至蕪湖地區地勢低窪，湖沼棋布，常有氾濫，沿海一帶均築有捍湖塘堤。¹³從以上的調查結果來看，松滬地區無險可守，因此早在抗戰爆發前夕，軍事委員會結合了德國顧問的建議，在浙江、江蘇省境設立了國防線。時任浙江省主席的黃紹竑提到這段往事，他指出：「中央對於蘇浙國防，亟謀鞏固，計畫建築永久國防工程。分為錫澄線與乍平線，乍平線係由浙境之乍浦鎮起，經平湖嘉興兩縣，而致蘇浙交界之王江涇鎮，全長約80餘公里。」¹⁴由於松滬地區無險難守的特性，松滬戰役爆發前，統帥部指定由88師以一個團一吳求劍上校的第523團，化妝為上

9 蔣中正，〈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下冊》，（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6年1月），頁3。

10 張柏亭，〈八一三松滬戰役親歷記〉，《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第45卷第2期，1984年2月），頁14。

11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頁112。

12 白崇禧，《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6月），頁139。

1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松滬會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年9月），頁7-8。

14 黃紹竑，《五十回憶》（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6月），頁363。

海保安隊，分批前往上海，利用地方關係作掩護，在閘北寶山路、龍華、徐家匯、虹橋、北新涇、真茹一帶，秘密構築工事，¹⁵上海市區的工事構築必須極為隱密，上海市政府為此增設了軍事科，並將工事構築計畫交由上海市工務局承辦，工事的建造則委由上海「朱森記」營造公司負責。興建工事時，為免日方注意，故均先蓋一大民房，然後在民房內建築鋼筋水泥碉堡。¹⁶

二、戰役經過簡述

民國26年8月9日，日軍海陸上尉大山勇擅闖虹橋機場，遭我守軍擊斃，上海局勢更為緊張。上海市保安總團也在8月11日下達備戰命令，在8月12日0300前將陣地構築完畢，並斷絕交通，掩護國軍部隊於真茹車站下車，並進入陣地¹⁷。8月13日下1500前後，國軍88師262旅由旅長彭軫英率523、524兩團，以524團在右，523團在左，迅速展開佔領陣地。敵人也正由虹口地區，沿吳淞路北四川路行動中。523團所屬第1營向八字橋搜索前進，當先頭抵達八字橋西方時，日軍前哨部隊亦到達，雙方針鋒相對，立即發生衝突。¹⁸淞滬戰役爆發，標誌了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開啟，全國軍民於蔣委員長領導下，展開八年的浴血奮鬥。淞

滬戰役爆發到結束總共區分為三個階段：淞滬圍攻階段、淞滬陣地戰階段及轉移陣地階段。淞滬圍攻階段自26年8月13日上海保安團與日軍海軍特別陸戰隊對峙衝突至9月15日日軍第3師團登陸瀏河為止；陣地戰階段由9月15日至11月8日日軍登陸金山衛、全公亭等地，我軍側翼暴露，淞滬守軍轉移陣地至12月11日我第15集團軍轉移至蕪湖為止，淞滬戰役告一段落。

（一）淞滬圍攻時期戰鬥概要（8月13日至9月15日）

此時期的國軍，依據早先擬定的計畫方案，針對佔領租借區的12000名日軍海軍陸戰隊為目標，由第三戰區（司令為馮玉祥；後由委員長自兼，顧祝同副之）負責統轄，主攻部隊為第五軍（軍長張治中）所統轄的第87師（師長王敬久）、88師（師長孫元良）、36師（師長宋希濂）及第56師（師長劉尚志）、57師（師長阮肇昌）98師（師長夏楚中）及獨立20旅、教導第2團、戰車第1、2連、上海保安、警察總隊、砲兵第3、8等團及重砲兵第10團等戰鬥、戰鬥支援與勤務支援部隊共計數萬人，自8月13日開始，輪流向日軍上海駐屯軍司令部進攻。8月14日，日軍下達第3、第11、第14等師團的第3次臨時動員，將動員第1日訂為8月

15 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戰役親歷記〉，頁14-15。

16 王紹齋，〈813淞滬戰役始末〉，《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第41卷第6期），頁61。

1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市保安總團813淞滬戰役戰鬥詳報〉，《民國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第8期，1987年5月），頁57。

18 張柏亭，黎東方註〈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傳記文學》（台北：第41卷第2期，1000年11月），頁14。針對813淞滬戰役第一槍的問題，黎東方教授曾於傳記文學第41卷第3期中之第66頁中有過小小的附註，因為有三個單位同時提出淞滬第一槍是該單位所發。這三個單位分別為第88師523團第1營於八字橋；87師261旅于嚴家宅。還有就是上海保安團於寶山路與寶興路交叉處對空鳴槍。另根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1974年出版之《支那事變陸軍作戰》其中所述：「13日1030左右開始，由於商務印書館附近的中國軍突然向陸戰隊陣地射擊，因此我方也予以做暫時之應戰。」經查商務印書館所在地適值上海保安總團之作戰地境，因此與吉章簡總團長所言與日本紀錄較為相符。



16日，這個階段是淞滬戰役最驚心動魄的一段。因為自甲午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遭受日本的攻擊，歷經九一八及一二八等事件，國人心中早已激憤不平，加上盧溝橋事件的影響，讓對日抗戰的意志衝到頂點。8月20日國民政府大本營下達「大本營訓令第一號：戰爭指導方案」。其中針對第三戰區的指導如下：「迅將目下侵入淞滬之敵陸、海軍及其空軍陸上根據地掃蕩撲滅，以準備敵軍在來時之應戰，同時對於浙江沿海敵可登陸之地區，迅速構成據點式之陣地，阻止敵人登陸，或乘機殲滅之。¹⁹」而在大本營訓令第4號，更清楚的將第三戰區（淞滬戰區）劃分為：（甲）淞滬圍攻區，指

揮官張治中；（乙）江南岸守備區，指揮官霍揆彰；（丙）江北岸守備區，指揮官常恩多；（丁）杭州灣北岸守備隊，指揮官張發奎；（戊）浙東守備區，指揮官劉建緒。²⁰

根據張治中的回憶：「20日晚上我乘月夜親赴江灣前線督戰，指揮各部隊繼續猛攻，並以98師全師加入，準備以全力先攻略楊樹浦。36、87兩師的第一線推進到百老匯路、唐山路、華德路之線。」²¹時任36師師長的宋希濂提到強攻匯山碼頭的戰況：「262團胡家驥團長下令：『不顧一切犧牲，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於是我軍官兵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巷戰，進行築屋爭奪的戰鬥。由於我官兵視死如歸，



第三戰區全般部署圖（作者繪製）

1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國民政府大本營關於全面抗戰作戰指導方案等訓令4件〉，《民國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第7期，1987年2月），頁23。

2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國民政府大本營關於全面抗戰作戰指導方案等訓令4件〉，《民國檔案》，頁31。

21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頁126。

義無反顧，憑著英勇無謂的氣慨，一舉衝過了唐山路。胡團長身先士卒，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帶領部隊繼續前進，他自己也五處負傷，但仍堅持不下火線，繼續指揮戰鬥。²²」負責左翼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主攻的88師264旅，由黃梅興旅長率領全旅官兵由愛國女校方面，自左翼旋迴壓迫敵軍，逐次前進，敵軍利用特製的防盾，一面頑抗一面後退。而在21日，黃旅長正與孫元良師長回報戰訊時，遭敵迫砲擊中殉國。使得攻擊日本海軍司令部的計畫不得不暫時停止。²³

國軍各部隊在上海戰場各有所斬獲，而日軍鑑於兵力單薄，陣地有遭突破之虞，因此陸續將其動員之部隊投入淞滬戰場，計有22日12師團天谷旅團登陸川沙鎮，25日第8師團一部及第3師團全部分由吳淞口及引翔港登陸。27日第11師團及第1師團之安藤旅團在蘊藻濱登陸，9月5日，近衛師團於引翔港；11日第9師團於虬江碼頭；23日第1師團竹內旅團於吳淞口。至此，日軍在上海地區總共高達6個師團約18萬人。而國軍部隊自日軍增援登陸開始，亦同步調整指揮體系與部隊。國府大本營派陳誠將軍為前敵總指揮，統一指揮淞滬戰場。陳誠在接獲委員長任命後，統率第15集團軍於24日到達責任地區，加入左翼，後來中央軍由朱一民（韶良）指揮，右翼軍由張發奎指揮，向登陸之敵猛攻。²⁴時任73軍軍長的王東原將軍，回憶當時的情景時提到：「奉令接替劉行陣

地，遂連夜構築工事，將部隊全部掩蔽於地面下，部署完成，嚴陣以待。兩日後（28日）寶山友軍被迫後撤，正面之敵，為日寇第三師團，即來進犯，晨起砲轟後，即有敵坦克廿餘輛侵入我劉行防線內。當時我90團任劉行守備，周團長先仁在掩體內，以電話報告戰況，事甚緊張，我當告以：『要鎮靜、要沈著、要集中火力射擊坦克後面尾隨的步兵，使不得前進，只要敵步兵不侵入，一俟坦克油盡，必撤退無疑，要咬緊牙關，堅持到底。』周團長照著我的指示，專打敵之步兵，使不得前進。結果到了下午三時，果然坦克全部退去，檢查我官兵傷亡百餘，工事多處被毀，械彈無失，周團連夜修補工事，使陣地更臻鞏固。²⁵

（二）淞滬陣地戰時期概要（9月16-11月8日）

自日軍於川沙瀏河等地不斷增援登陸後，淞滬戰役已進入了新的階段。此時國軍部隊也已從全國各地加入戰局。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長官由蔣委員長自兼，顧祝同副之）部頒佈第二期作戰計畫，其指導要領如下：

1. 戰區以保持上海我經濟重心、鞏固首都、而行持久抗戰之目的，就以成之包圍態勢，運用優勢兵力，斷絕各處登陸敵人之聯繫，限制其發展，且圍攻獅子林及川沙方面上陸之敵，打破其包圍我軍之企圖，而收個個擊破之效果。

22 宋希濂，《鷹犬將軍》，（台北：李敖出版社，1997年5月），頁164。

23 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戰役親歷記〉，頁15-16。

24 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台北：國史館，2004年5月），頁54。

25 王東原，《浮生簡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10月），頁55。



淞滬會戰淞滬圍攻區作戰圖

1937.08.23-1937.08.27



淞滬戰役圍攻時期示意圖

(本圖依據抗日戰史(1)插圖6及其他資料繪製)

2. 個個圍攻之目的不能達到時，則依狀況逐次後退於敵艦砲射程外，以決戰之目的，乘敵海陸軍火力不能協調之際，一舉而擊破之。
3. 於萬不得已時，則退守後方既設陣地，實行勒強抵抗，待後方部隊之到達再行決戰，而收最後勝利。²⁶

此時的戰鬥地境已然擴大，雙方加入戰鬥的人員皆有所增加，而國軍方面依恃這早先設立好的國防工事，持續抵抗日軍的攻擊，同時，全國各界響應抗戰的熱情與支援，亦源源到來。本階段雙方交戰的重點在於瀏河－羅店－江灣－上海之線。張發奎任右翼指揮官，中央

指揮官先是張治中，後以朱紹良，而左翼為陳誠。國軍在長江沿岸的陣地雖然受到日艦艦砲的牽制，因此第一線陣地距離岸際有一段距離，但上海市區內的核心陣地一閘北，仍牢牢掌握在國軍88師的手中。這種堅毅的精神，正是抗日序戰的淞滬戰場參戰官兵以血肉構築的堡壘。日軍的攻擊模式皆按照空攻－砲轟－步戰協同等三階段進行攻擊。由於我空軍初建，戰機有限，而砲兵部隊則集中使用於重點方面，對於其他友軍的支援有限，因此傷亡十分慘重。其中補充來的人員，由於要避開敵機白天的狂轟濫炸，都是晚上到達前線，立即投入戰鬥。有許多官兵連符號都沒來得及發就犧牲了。²⁷而一般官兵於缺乏制空權下，各項行動更為

2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二）》，頁65。

27 宋希濂，《鷹犬將軍》，（台北：），頁167。

困難。王東原軍長為了要視察前線，必須頭上戴著偽裝草帽，令參謀副官衛士分散遠離，單獨一人行動，敵機誤認是傳令兵，不加轟炸，反得安全。兵力的部署，因應當時情況，漸採分散制，愈益加大縱深，即每一村莊，每一叢林，每一可用為據點處，必有兵據守。其兵力為一排或一班，排班各自獨力作戰，月分散愈有利，最後造成一個「地網」。初期傷亡至重，其後逐漸減輕，如是堅守劉行一線至28日之久，屹立不動。²⁸在上海兩軍混戰之際，我國童子軍在戰傷救助方面也發揮了很大的功用。當年任職第1軍第2旅第4團的上兵王天魏回憶在滬戰場受傷時，白天日軍天上有氣球監視，飛機大砲又不停的轟炸砲轟，救護人員根本不能上前救護，傷員也無法送下去。他躺在稻田裡，一直到晚上大概9-10點鐘，突然聽到有人低聲呼喚：「有人嗎？」，王天魏本能的回答了一聲，不一會兩個身著黃軍大衣的人彎腰跑到身邊，竟是兩名十六七歲的少年。初以為是衛生隊的救護人員，交談始知是上海童子軍戰地服務團一線救護傷兵的。²⁹

就日軍方面而言，日軍的作戰構想為：「與海軍聯合，以有力之一兵團在川沙鎮方面，以主力在吳淞附近登陸，擊破當前的中國軍隊，爾後佔領上海及該地北方要線，保護日本人民。」³⁰而其計畫則是自23日黎明前開始登陸

，爾後以登陸川沙鎮附近之第11師團，迅速推進至羅店鎮，促使準備對嘉定之攻擊，以及爾後向南翔及顧家宅附近之前進，促使登陸於吳淞附近之第三師團確保該地附近，並準備向大場附近之前進。³¹簡單來說，日軍登陸後先取羅店，再下嘉定，然後向淞滬戰役的國軍指揮中心—南翔鎮推進。日軍在川沙鎮登陸後，在其優勢海空軍及步砲裝協同兵力下順利推進，迫使國軍退守二線陣地。

對比國軍與日軍的作戰構想，決戰的關鍵在於中、日兩軍是否能夠「協同一致」集中兵力形成重點進行決戰。國軍在上海集中優勢兵力尋求在登陸點、獅子林及上海市區交手，而日軍亦必須打破國軍集結重點，因此不斷以海空軍阻撓國軍上海兵力的集中。從歷史的發展審視，日軍成功的達到其目的。88師師長孫元良將軍在日後特別強調了這個原因：³²

國軍的兵力雖為日軍的3倍，但並未能以多打少，攔潰日軍，或形成包圍，而是如小說上說的「車輪戰法」，又好像封神演義，眾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黃河陣，神仙們是個別進陣去的，不是集體進入的。各個神仙個別地在黃河陣裡吃著混元金斗的虧，或先或後，削去了頂上的三花。因為國軍準備既未充分，運輸也很遲滯，所以很難於在短期間內一次集中備於敵軍的兵力，形成優勢力量；只好以數量上的

28 王東原，《浮生簡述》，頁56。

29 王天魏，〈813淞滬抗戰親歷記〉，《紅巖春秋》，（上海：第1期，1994年2月），頁43。

3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劉水山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從盧溝橋是便到南京戰役》，（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392。

3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劉水山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392。

32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台北：時英出版社，2008年7月），頁208。



多（不是在短期內集中數量的優勢）來補救質量及其他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來換取敵軍的消耗，達到持久的目的。

當時擔任第15級團軍總司令的陳誠將軍，日後檢討當時的戰略，也提到滬戰未能克竟全功的原因其中一點也是兵力不能集中。他指出：

當滬戰爆發以後，我軍以五師之眾，對數千的敵陸戰隊實行攻擊，竟未能奏功，實在是當時部署種種不當的緣故。譬如不能徹底集中兵力，形成重點，以及步砲沒有協同動作，都是比較顯著的事實。³³

何以兵力未能集中？運輸問題是必須考量的重點。抗戰初期德國軍事顧問曾經來華助戰。其中法肯豪森上將（Gen. Leutnant Von Falkenhausen）曾經針對滬戰運輸問題提出看法，他認為：「自中日開戰以來，我（國）軍鐵道運輸未能充分運用，其最大的原因在管理軍運者無適當計畫，且各軍部隊隨意干涉路政，擅扣車輛，其結果使車輛多數擁擠前方，而後方待運軍隊及軍火幾養等無法運往前線，予敵軍良好目標肆行轟炸，所受損害實非淺鮮。」³⁴孫元良將軍的回憶更證實了法肯豪森的觀點：「記得有一支隊伍從老遠開到江灣火線後面，預定休息幾天，再去接替前線陣地。他們擠住在幾個鄉村裡，舉火造飯，炊煙四起；空

場上曬滿了換洗的衣服，隨風飛舞。於是引來敵機，敵機差不多觸著屋頂，機槍亂射，炸彈亂擲。這麼一來，這支還未上火線的部隊又要調回後方去補充整訓了。」³⁵另外抗戰時期擔任鐵道部長的張公權，認為鐵路運輸之遲滯，與日軍不斷轟炸有關，他提到：「淞滬血戰開始，三個月中，京滬間開型軍用列車1346次，運送軍隊50個師，輜重5萬噸。自8月15日起，敵機開始轟炸南京，各站幾乎無日不炸，越炸越烈，以上海、真茹、南翔、蘇州、常州各站為最甚，日幾六七次，使日間無法通車，不得不改在夜間行駛。以調度電話時被炸斷，行車亦增困難，各車站辦公房幾均炸毀，工作效率漸漸減低，軍運車輛漸有遲滯。」³⁶不論是主觀用兵上的調兵方式，或是客觀環境的限制因素，都讓淞滬戰役的困難性大為提高。

早在滬戰之初，日本國內政軍界便對於日軍未來動向產生爭論，因為在華北與華東同時開闢戰場，令日本有兩面作戰的困難，為了決定主從，8月20日日軍軍令總長及參謀總長擬定了一個「中日戰爭指導要綱」，確認持續增兵華北，日本國內進行第四次動員，編成第16師團、108師團、109師團，動員第一日設定於8月30日。成立華北方面軍司令部，下轄兩個軍級單位。而中華民國政府也於26年9月12日向國際聯盟控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上海的戰事繼續的進行，而新的進展已經悄悄

3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陳誠私人回憶資料（上）〉，《民國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87年2月，第7期），頁18。

3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演講紀要（下）〉，《民國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2005年5月，第80期），頁26。

35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頁208。

36 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4年6月），頁136。



淞滬戰役陣地戰時期示意圖

(本圖依據抗日戰史(2)插圖12及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插圖9及其他資料繪製)

展開。

(三) 淞滬戰役轉移陣地時期

日軍早在抗戰之前便已經針對侵略中國的步驟，做了詳盡的兵棋推演。在昭和12年度的對華作戰計畫是：在長江下游地區作戰時，以約三個師團登陸於長江下游的白茆口（上海西北約75公里）另外以兩個師團為基幹的一個軍，登陸杭州灣乍浦附近，同時向南京進攻，以佔有上海、南京、杭州的三角地帶為方策。³⁷但是由於日軍仍然認為，中國當時仍有和談的希望，因此抱定著「不擴

大方針」，決定合併使用手中保存的兵力，與自華北抽調轉用的部隊，與日本本土動員的部隊。³⁸在10月20日下達臨參命第120號：第10軍戰鬥序列。主要者為：第10軍司令部、第6、18、114師團。如此調整下，華中方面變成兩個軍9個師團，華北方面則變成兩個軍7個師團；主作戰明顯地轉移至華中，成為敵我主力的對決態勢。³⁹以當時日軍的作戰構想是以華北為主，華中為輔，但何以會調整為華中為主，華北為輔？原因在於1937年10月4日日本參謀本部下村定作戰部

3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劉水山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554。

3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劉水山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556。

3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劉水山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558。



長召集相關人員針對「是否擴大華北方面的作戰以實施山東作戰，或將其停留於適當戰線轉用兵團至上海方面」為議題，進行研究。當時主管作戰部門人員認為：「由於上海在於缺乏戰鬥器材的狀態，故應予必要的補給，惟5個師團的兵力以大致足夠。」但下村認為若上海方面維持原狀，則未能結束戰爭；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此一方面積極行動，以獲得所望戰果。日本參謀本部判斷：如果蘇俄採取對日攻勢，可能會在11、12的晚秋初冬左右，在此最危險的時期，戰線若呈現膠著狀態，則無形中對蘇俄提供了對日攻勢好機會；於是企圖至該期間以前打開戰局。⁴⁰日本參謀本部認為，蘇聯將會攻擊日本，因此集中兵力解決淞滬僵局，才能於停戰後回防蘇聯。

日本主觀認為蘇聯將會與其進行大規模的決戰是否屬實？根據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的回憶指出，「楊杰（時任我國駐蘇聯軍事採購團長）與蘇聯國防部長伏洛希洛夫元帥的談話中，楊獲得了蘇方的承諾，一旦日本佔領南京，蘇軍將對日作戰。」⁴¹從蔣廷黻的回憶中顯示日本的顧忌並非空穴來風，蘇聯國防部長（或是他個人意見）認為日蘇將會一戰。在國內蘇軍參戰對抗日軍的說法亦甚囂塵上。後來發現與中共的宣傳有關，陶希聖提到：「抗

戰爆發之初，中共及其同路人到處散播謠言，說抗戰戰爭延長了，蘇俄就要參戰。這一謠言可以張大中共勢力，便利左派活動。」⁴²但實際上的情況如何？顧維鈞博士時任我國駐法國大使，以他的觀察，他引用波蘭駐法國大使盧卡塞維茨的觀點（盧卡塞維茨曾任波蘭駐蘇聯大使）：「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莫斯科一向指望中、日衝突會導致日本和英國的交鋒。這一交鋒將使日本大為削弱而使局勢對蘇聯有利。⁴³」從波蘭駐俄大使的角度，認為蘇聯不會主動與日本發生衝突。波蘭的觀察是如此那蘇聯外交官做如何的想法呢？顧維鈞大使9月22日得自他國外友人員轉述蘇聯外長李維諾夫的訊息：「中國的抗戰削弱了日本，德國也就不敢在歐洲動手了。問到有關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時，他說，蘇聯已經在用物資進行支援。至於蘇聯之所以不採用任何軍事行動來幫助中國反抗日本這個問題，他所做的解釋是：蘇聯任何的行動，都可能被認為是對日本的侵略行為。」⁴⁴綜此，蔣廷黻在給政府高層的具體意見中提到：「我身為駐蘇大使，僅能從蘇聯角度看問題。不過，我敢肯定：除非日本先對蘇聯下手，蘇方不會對日作戰。」⁴⁵在蔣氏的意見後，國民政府派遣孫科前往蘇聯親歷其境，證實了蔣廷黻的推斷屬實。從當年我國駐外代表的各項資料中，明顯說明了蘇聯並不會主動出兵日

4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劉水山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552。

41 蔣廷黻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2月），頁200。

42 陶希聖，《陶希聖先生訪問記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6月），頁70。

43 顧維鈞著，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翻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月），頁469。

44 顧維鈞著，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翻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冊）》，頁496。

45 蔣廷黻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201。

本，顯然日本防蘇的考量多慮了，但卻因為如此，因緣際會的扭轉了日軍進攻的軸線。

1937年11月5日，第10軍登陸杭州灣金山衛附近成功，立刻向黃浦江突進。當日軍於金山衛登陸後，陳誠向委員長意見具申表示：「宜縮短陣線，蘇州河部隊應速轉進武進一帶之國防線中。」委員長經半個小時之考慮，准照此議辦理，但旋因此時九國公約國正在比京開會，委員長為爭取國際聲譽，令再支持三日。

⁴⁶11月8日第3戰區第3期作戰計畫於吳縣發出，指導要領如下：

1. 京滬方面，以最小兵力，利用吳縣、福山線陣地拒止敵人，不得已時，逐次轉移於無錫、澄縣及宜興、武進等線陣地。
2. 由京滬方面，抽調2師（除第7軍）經宜興、長興至吳興，歸張發奎總司令指揮，同時以砲兵大部轉移於滬杭方面，另抽調較次之3-5個師，回任首府拱衛，並構築工事。
3. 滬杭方面，守備崇德縣、石灣鎮、南潯鎮線及臨平線、吳興線，最後以劉建緒司令所部，退守杭州附近，第7軍之徐、程2師退守長興縣附近，待川軍到達後，轉移攻勢。
4. 續到川軍6個師，車運者，由南京汽車運輸至廣德附近；船運者，由蕪湖、宣城再用汽車運輸至寧國附近集中，置重點於廣德方面，攻擊滬杭方面之敵人。

5. 京滬方面不堪作戰之部隊，即可抽出之資材，即運送到後方。

雖然退命令已經下達，但日軍的壓力仍未減輕。當時任第一軍軍長的胡宗南將軍回憶：

「公（指胡將軍）所部經徐州訓練，較勝於他部，而公日夜在戰場指揮撫巡，從未離去，官兵見之，無不感奮。後白（崇禧）總指揮向第三戰區何司令長官（按：應為蔣委員長）報告，有云：『桂軍10個師只打1天，只有第1軍能打，該軍兩個師陣地，始終屹立不動。』」

⁴⁷前文中第一軍袍澤王天魏的回憶亦正可以作為第一軍的戰績描寫。

淞滬戰役期間我空軍也自各地起飛，應援地面戰鬥。首先投入戰場的是8月14日上午0840由第2大隊孫桐崗副大隊長，率全大隊21架妥善的Northrop Gamma 2E（當時空軍俗稱「諾斯諾普」或「諾機」）機由廣德出發，一路轟炸吳淞口的日本軍艦；另一路則攻擊公大紗廠及匯山碼頭。下午1440原班人馬再度出動，轟炸公大紗廠及日軍司令部。⁴⁸同時駐地周家口的第四大隊亦接獲命令支援上海戰場，由第四大隊21中隊長李桂丹率全大隊27架Hawk-Ⅲ於1300起飛出發。⁴⁹同時在日軍方面，8月13日下午日空軍鹿屋航空隊接獲第3艦隊司令部的命令，於14日下午1455從台北起飛攻擊杭州與廣德附近的機場。從松山機場起飛的18架三菱G3M2轟炸機（一般俗稱的96式陸攻）18架分為杭州與廣德攻擊隊，因為颱風的影

46 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頁58。

47 胡宗南上將年譜編纂委員會，《胡宗南上將年譜》（台北：國防部印製廠，1972年2月），頁82。

48 劉文孝，《中國之翼第二輯》（台北：中國之翼出版社，1991年9月），頁6。

49 劉文孝，《中國之翼第三輯》（台北：中國之翼出版社，1992年4月），頁11。



響，廣德隊在浙江境內繞圈，於1940時到達目標投彈，全隊返回松山機場。而杭州攻擊隊則於1725時於笕橋投彈，高志杭大隊長擊落姚崎義喜雄空曹所駕駛之96機，李桂丹副大隊長在浙江喬司附近擊落該攻擊隊的3號機三井敬之一空曹所駕駛的96機⁵⁰，締造了我空軍首戰勝利的紀錄。淞滬戰役時期，國軍在物資極度缺乏的條件下，給予日軍重大的打擊。而國軍將士更是發揮了視死如歸的精神，以血肉之軀，向敵人的機槍、火炮陣地前進。

參、精神動員理論

一、精神動員的基礎

精神動員就好比一座龐大的機器，機器的啟動必須經過許多過程，以系統的角度而言，

精神動員也是一種思維體系的運作，這種運作必須要有思想作為基礎。這種基礎個人認為就是「意識型態」。意識型態（Ideology）的定義學者莫衷一是，中西學者看法各異，為了建立討論的基礎，首先瞭解各家學說內容，而後再進行分析。David McClelland認為，意識型態有兩種思維脈絡，第一是真理與實在相對應，而觀察與理性應能使一切懷有善的意志的人，通過源自於運用自然科學方法所確立的社會科學方法，得以認識之實在。另一個脈絡則是認為各種社會並非是由穩定的意見一致合在一起，而是一個個被衝突撕裂的、變化著的實體，同時懷疑任何客觀的方法來決定什麼是事實。⁵¹McClelland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強調意識型態的兩種特性：主動的創造與被動的認



淞滬戰役一般經過要圖

（本圖參考國防部史編局出版之《抗日戰史》第一冊插圖1重行繪製而成）

50 張文，〈六比〇還是四比一？墜海的日本96陸攻下落〉，《全球防衛雜誌》（台北：全球防衛出版社，第289期，2008年9月），頁98-102。

51 David McLellan著，施忠連譯，意識型態（台北：桂冠出版社，1991年5月），頁11。

識。Michael G. Roskin認為意識型態的定義如下幾項：「意識型態是一種相信事物能比其本身更好的一種存在的信念，它是一個改造社會的計畫。⁵²」Roskin的定義不涉及意識型態的由來，而以功能性作為定義的基礎。Andrew Heywood認為意識型態所包含的亦含有以下幾端⁵³：

- 它是一種政治上的信念體系
- 是為了催生行動而生的一種政治理念
- 代表統治階級的理念
- 代表某一種社會階級或團體的世界觀
- 是表明階級或是社會利益的政治性理念
- 是被剝削或是被壓迫階級的錯謬意識
- 使人產生歸屬於某種社會群體的感覺
- 是官方所認定的政治理念，用來增加體系的正當性
- 號稱獨享真理的全方位政治教條
- 是抽象但高度體系化的政治理念

Heywood廬列的許多意識型態的特徵，以解釋意識型態到底為何物，有助於我們釐清意識型態的樣貌。Leon P. Barada對意識型態也有所著墨：其特徵在於1.它主要是個政治的詞彙；2.每一個意識型態包含對於現在的觀點和對未來的期待；3.意識型態是行動取向的；4.意識型態是針對群眾而設計的；5.意識型態通常以一種非常淺顯的字眼做號召，使其可以被一般群眾理解，基於相同的理由，意識型態通常在語氣上是具煽動性，它傾向於群眾能盡

全力地為意識型態的目標而奮鬥。⁵⁴Barada的意識型態的功能性較前面幾位學者更為凸顯。而國內學者馬起華教授認為意識型態（馬教授譯為「意理」）是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觀念。⁵⁵馬教授將意識型態的兩個重要特徵勾勒出來，同時以「觀念」來指涉意識型態的本身。受限於篇幅，因此將上述中西學者對於意識型態的說明作綜合理解，採存同去異的方式瞭解意識型態的概況，得出的結果是：「意識型態是以道德為基礎，運作於團體中，高度抽象化的觀念體系」。意識型態必須要以道德作根基，如果沒有道德基礎，則無法推展到團體的每個人。同時這個團體不限於國家，某種宗教組織、非營利機構等都會具備某種特定的意識型態。此種「觀念體系」本身追求的就是道德（善），但其手段卻不一定符合道德，為了淡化對意識型態本身的價值判斷，在此對意識型態不做褒貶。

以意識型態作為精神動員的基礎，具有幾種好處。首先是具有足夠號召力。意識型態並非單純的觀念，這種觀念是為了要達到某種目的。其工具性的本質無法拋棄。因此，以意識型態作為精神動員的基礎，不但讓精神動員獲得合法性，同時也藉意識型態擴大動員的效果，相得益彰。其次，意識型態高度抽象的特質，讓精神動員不需重新建構理論體系，轉化意識型態的觀念，納入精神動員架構中就能立即運作。精神動員大部分運用於非常時期，通常



52 Michael G. Roskin,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91), p102.

53 Andrew Heywood 著，陳思賢譯，政治的意識型態（台北：五南出版社，2009年1月），頁5。

54 Leon P. Baradat 著，陳坤森等譯，政治意識型態與現代思潮（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年6月），頁12。

55 馬起華，政治心理分析（台北：正中書局，1977年11月），頁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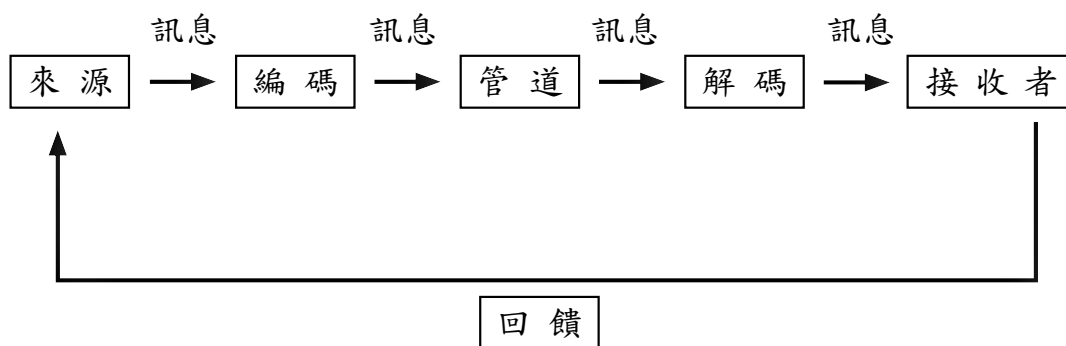


非常時期的發生是猝然的，當面臨緊急事變時，如何在短時間內獲致精神動員的效果，其基礎必須於平時建立，因此意識型態是精神動員體系中的根基，也是精神動員的靈魂。

二、精神動員的管道

有了精神動員思想依據後，接下來便是如何將這個思想依據在最快的時間內，傳達到全國各個角落，同時在傳達的過程不能有所曲解，更不能質疑。我們從組織學的角度觀察精神動員的動員管道，組織間的溝通將是本段關注的焦點。組織學的溝通觀點認為，團體或組織內部的溝通有四大功能：控制、激勵、表達情緒、資訊，溝通以數種方式控制人們行為。⁵⁶而溝通在組織中是調整性的工具；在於調整人與人之間、人與團體間、及人與組織間的系統整合、任務角色及技術能力的重要因素；溝通能使不同的角色任務、活動方式、技術能力、工作流程、團隊工作等得以整合。⁵⁷因此不論是整合的角色，或是調整的角色，溝通都負

擔關鍵性的作用。從組織學理中再予以精確定義，所謂溝通就是：「由發信者將他的意圖，經由心智過程解讀信息，將這個信息傳給接收者。」⁵⁸Robbins將溝通細分為七個程序，這七個程序分別為：溝通來源、編碼、訊息、管道、解碼、接收者、回饋等七項。⁵⁹下頁圖一是Robbins溝通過程圖像化，其中溝通來源、管道、接收者、回饋等是研究溝通現象所熟知的四個個體，而Robbins進一步將編碼（encoding）與解碼（decoding）獨立出單獨個體，顯示他對訊息的編碼與解碼有特別的觀察。因為他認為即便是同樣一種文字語言，年齡、教育程度與文化背景的差異，會造成編碼與解碼的誤差，訊息的編碼與解碼是根據個人的文化背景來進行，因此文化的差異性便影響了溝通的進行，傳遞者與接收者之間的背景差異性越大，賦予特定語言與行為的意義差異性也越大。來自不同文化對同一件事的看法、解釋、評價也不一樣，因此會產生不同的結果。⁶⁰



圖二：溝通過程圖，摘錄自Stephen P. Robbins著，李茂興譯，組織行為

56 Stephen P. Robbins著，李茂興譯，組織行為（台北：揚智出版社，2001年3月），頁178。

57 李長貴，組織行為（台北：華泰文化，1998年4月），頁204。

58 李長貴，同上註，頁205。

59 Stephen P. Robbins著，李茂興譯，組織行為，頁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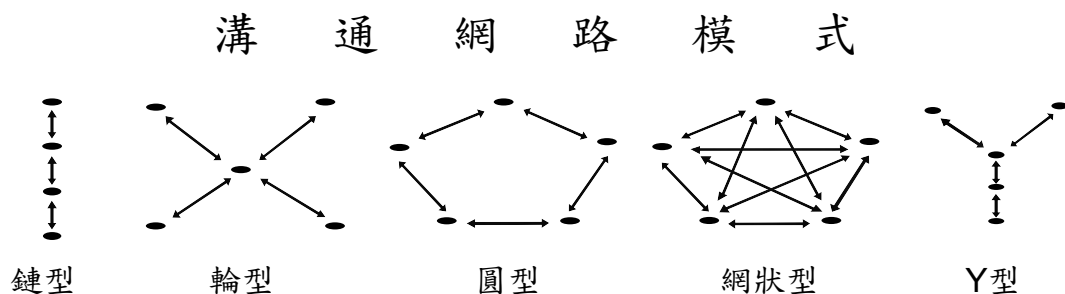
60 Stephen P. Robbins著，李茂興譯，組織行為，頁191。

Robbins的觀察並非小題大作，因為從經驗角度審視，即便是最正式的面對面溝通（如會議）都會因為組織成員的背景差異而造成大小不同的誤解，這種誤解就是「解碼」的不同。一般的情形希望解讀的正確性越趨近訊息發送者的原意最好，但Robbins認為除了編解碼的誤差會形成接收者的接收結果差異外，訊息的傳遞過程形成「過濾作用（filter）」也會對訊息造成影響。而資訊受過濾的程度，主要決定於組織層級的數目。垂直方向的層級數目越多，資訊受到過濾的機會越大。⁶¹而訊息溝通的正確性是組織的重大課題，但因篇幅限制，本文不加以深入探討，僅將溝通過程簡單描述，以作為精神動員管道的基本認識之一。

組織學中對於溝通提到另一個主要的議題，那就是溝通方向。組織中的溝通型態主要區分為兩種方式與三個方向。在溝通的方式中，水平與垂直式主要兩種溝通方式，而將垂直溝通方式再細分為向下與向上就成為溝通的三個方向。而向下溝通（downward communication）是以命令、告諭、只是等方式出現，旨在影響部屬的行為或行動。向上溝

通（upward communication）以報告的方式出現，旨在告知上級有關行為或行動的困難或成果。平行溝通（lateral communication）以協調的方式出現。⁶²平行的溝通通常是組織內部成員相互間的溝通方式，平行溝通的功能在於省時並促進工作上的相互協調，在某些情況下，平行溝通還會被正式鼓勵，但通常非正式的水平溝通就像是店路上的短路，會以打破垂直的階層順序，並促使執行特定行動。⁶³而垂直溝通是屬於正式的溝通方式，通常組織中會有正式的管道提供組織成員向上或向下的溝通。

溝通方向事實上是與溝通網路密切相關。Robbins針對溝通網路提出了五種模型，分別是：鏈型（chain）、輪型（wheel）、圓形（circle）、網型（all channel）與Y型。⁶⁴以上五種溝通網路幾乎每個組織都會具備，而且相互輔助。在以垂直溝通為正式管道的組織中，輪型或網狀溝通可能是非正式的溝通管道；而在以網狀溝通為正式管道的組織中，為確保訊息的正確性，垂直溝通也使必要的溝通手段，因此五種溝通方式因組織特性不同而有不同的發展。



圖三：溝通網路模式圖解（摘自：Stephen P. Robbins著，蔡承志等譯，組織行為）

61 Stephen P. Robbins著，李茂興譯，組織行為，頁188。

62 李長貴，組織行為，頁209-211。

63 Stephen P. Robbins著，李茂興譯，組織行為，頁182。

64 Stephen P. Robbins著，蔡承志等譯，組織行為（台北：桂冠出版社，1986年12月），頁308。



上述五種溝通網路模式，存在於每個組織中，但是屬於正視網路或非正式網路，則視組織的特性為主要區劃。而實驗室的實驗發現，當需要在所有成員中傳遞消息時，圓型網路較鏈型或輪型慢，且圓型在溝通時最缺乏精確性。因此鏈型和輪型在尋求高工作表現時較有效率，圓型網路中士氣較高，而在解決複雜問題時，圓型和網狀較快、較有效率。⁶⁵綜合而論，五種組織溝通網路中，以鏈型管道較為快速有效率，其他各型網路，適合各項不同組織。精神動員的作為是以戰時或非常事變時支援其他動員事項為主，因此對於訊息與效率方面的要求遠高於其他，由此可知精神動員的溝通以垂直管道為主，平行管道為輔；其溝通網路以鏈型為主，其他為輔，藉以達到迅速發揮動員效果之境界。

三、精神動員的手段

精神動員的架構中，意識型態是主體，溝通管道是傳遞意識型態的網路。除此之外，還要瞭解精神動員的執行手段。精神動員的實施，雖然是戰時或非常事變時期的作為，但其預備與規劃，卻必須在平時就要建立起來。精神動員的手段，由時間的長短分析，可區分為短期間的宣傳與長時間的教育。宣傳與教育都具有相同的目標，但其方法迥異，宣傳是短時間內將宣傳內涵讓受眾吸收，藉以發生效果，其對象沒有年齡的限制，在精神動員方面，是面臨戰時或非常事變時得必要手段。而教育則經過長時間的規劃與設計，針對學齡人士（國民

教育或專業教育）進行長時間有系統的思想灌輸，使其想法觀念產生某種程度的變化，這些變化經過長期的醞釀，效果顯著，但必須經過較長的時間。

（一）教育

以國民教育振興國家民族的西方典範是德國，國民教育無論從名稱或實際上來說，是由德國開始，又以德國實行的最為徹底。所以要把握國民教育的基本精神，便要從德國入手；而德國國民教育的首倡者就是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見於其「告德意志國民書（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⁶⁶費希特的告德意志國民書是匯集他的14篇演講集。演講的時代背景是拿破崙崛起後不久的1808年，費氏見分歧的德國無法抵擋法軍入侵，因此他在任教的柏林大學發表了對當時「復興德意志」的觀點。這14篇演講內容範圍很廣，從教育、日耳曼民族、語言、道德等均有涉略，惟不斷的提到教育，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主觀認為，要復興德意志必須以國民教育，改變當年自私自利的德意志民族體質；其二是客觀環境上，法軍佔領德意志各邦後，嚴格控制政治、軍事、經濟等社會機制，唯獨教育的部分沒有干涉，因此主客觀因素的配合下，14篇演講由是產生。費希特從分裂的「德意志王朝神聖羅馬帝國」遭到拿破崙的佔領，認識到國家的重要性，開宗明義的指出：「德國之所以亡，是由於整個德國國民把自私自利的



65 Stephen P. Robbins 著，蔡承志等譯，組織行為，頁310。

66 賈馥茗，「國民教育的基本精神與任務」，楊瑩編，轉型社會中的教育（台北：民主文教基金會，1991年11月），頁3-4。

企圖，增高到極點的結果。」⁶⁷國民教育要使學生「學習與勤勞相連貫」，國民教育是人類美德的傳遞，在此同時，他將「國家」⁶⁸概念藉由國民教育的方式灌輸給每一位學生。而歷史也證明，費希特的構想日後成為德意志建國的重要依據。

17世紀德國的哲學是唯心哲學，費希特認為傳統教育的目標是知識的傳授，同時在教學程序上是由感官世界（具體）而思維境界（抽象）。所謂的「新教育」則是要反轉這種模式，將教育目標從單純的傳授知識為主轉化為以磨練精神為主。這種精神具有道德意涵，從道德的角度出發，「導引出崇高的祖國愛，遂致使人明白自己現在的生命，是負擔永遠和祖國的生命以及祖國的永遠性。」⁶⁹簡而言之，費希特的新教育，是以道德教育為依歸，將愛國情操道德化，進而使「德人心中形成了這種精神時，即生出德國人對祖國的愛。」他進一步的提出，為了執行此種國家教育，國家必須負擔學校的經費與師資培養，⁷⁰此外他對當時德國敗於法國喪失民族自信心提出看法，他指出：「德意志人，一般缺少迅速性和輕快性，無論對於何事都過於認真，過於笨重，且不善通融。向這種非難，是絕不值得引起我們引為羞恥的。我們應該駁歷史這種非難認作是最適當

的特性，更使這特性益為增大。」⁷¹費希特不因德國遭佔領而沮喪，反而向德國人民呼籲，利用日耳曼民族性的特點，發揮自身的優勢，重塑德國人的民族自信。

當然，以今日的眼光來看，費氏的呼籲在某些項目上早已成為各國遵循的方向。某些主張對現代民主價值也許有所衝突，但是費希特演說的出發點在目前而言，卻是各國共同遵循的目標。以國民教育作為愛國信念的手段，不僅可以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同時也可以灌輸國家觀念，具有多重的效果。

（二）宣傳

Jowett & O'Donnel所合著的《宣傳與說服》一書中，將宣傳界定為：「為『達成』一個由閱聽人而得的特殊反應或行動的『目的』以『促進宣傳者欲求結果的意圖』。」⁷²大陸作者王玉東在其著作「現代戰爭心戰宣傳研究」中，綜合了中外對於宣傳的概念，歸納出以下幾項「宣傳」一詞所代表的含意，包括了：輿論和心裡控制、觀念的灌輸、影響他人等⁷³而王玉東也針對宣傳下了一個定義：「宣傳是主體藉助符號對客體進行心裡引導作為。其中最本質的規定性是，宣傳是心理引導。」⁷⁴針對他的宣傳定義，大致上可以看出幾個特點，其一是他的定義點

67 菲希德著，臧廣恩譯，告德意志國民書（台北：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1955年5月），頁1。

68 實際上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概念，因為當時德意志王朝神聖羅馬帝國主要是由日耳曼民組所組成，僅有鬆散的「選侯國」，並無民族國家的樣貌。費希特希望藉由國民教育的目標，建立一個屬於日耳曼民族的國家，也就是普法戰爭後的德國。

69 菲希德著，臧廣恩譯，告德意志國民書，頁153。

70 當時的歐洲，教育大部分是附在宗教團體之下，由教堂及神職人員擔任師資。

71 菲希德著，臧廣恩譯，告德意志國民書，頁232。

72 Jowett, Garth S., O'Donnel, Victoria.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2).p9.

73 王玉東，現代戰爭心戰宣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頁18-19。

74 王玉東，現代戰爭心戰宣傳研究，頁20。



出了宣傳的核心目標：引導。其二是宣傳的工具是符號；第三宣傳的對象並未明示，只以「客體」作為說明，顯示宣傳對象並未限定是敵人，有可能是己方的群眾。針對客體的部分。西方文獻探討宣傳時，大都帶有負面的字句。在雙引號內的文字則表示宣傳所欲達到的效果。並且該書作者依照宣傳內容的性質，區分為白色（正確的消息）、黑色（錯誤的消息）、灰色（正確與否無法確認的訊息）⁷⁵。大陸學者對於宣傳則採用以下的定義：「宣傳是主體藉助符號對客體進行的心理引導行為。」⁷⁶同時劃分了多種宣傳心戰的內涵。其中在技術的部分，包括了冗餘與緘默、明示與暗示、感性與理性、漸進與速效。⁷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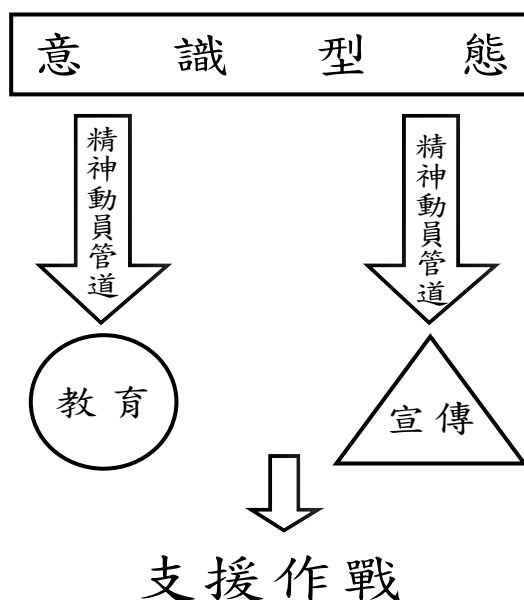
從上述的政治作戰史例而言，若以西方與大陸學者的區劃，則絕大部分對敵國是採用黑色、灰色的宣傳，並且在手段上是以冗餘、明示、理性與速效。而對精神動員的部分，則是採白色與灰色；在手段上是以緘默、明示、感性與漸進為主。當然其他的效果並非完全不用，而是在分配比例上的多少罷了。在傳播工具上，由於受限於技術層級，因此大部分採用口語、文字傳播，傳播的形式也較為單純。

在此特別要指出，本文的寫作觀點係嘗試建構一個精神動員的架構，這個架構或許不夠嚴謹，但冀望對於分析精神動員的個案或史例能夠產生聚焦的效果，茲將本架構以圖形方式

說明於下。

為了使精神動員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以上的意識型態、精神動員管道、教育、宣傳皆屬於靜態的架構，這些都是動員準備時期便已經完成好的架構，若要瞭解個案的精神動員，便可依照上圖的架構進行分析。必須說明的是，從方法論的角度，意識型態、教育、宣傳都屬於難以量化的概念，同時此架構屬於靜態分析，對於自變數的建立已溢出本文討論範圍，因此本文並不針對此架構的建立多所著墨，個人將另闢專文，探討精神動員的分析架構。針對本文的個案：對日抗戰，亦將以意識型態、精神動員管道、及宣傳等三個面向進行分析。

精神動員架構圖



圖四：精神動員架構圖



75 Jowett, Garth S., O'Donnel, Victoria. pp12-14.

76 王玉東，現代戰爭心戰宣傳研究，頁21。

77 王玉東，現代戰爭心戰宣傳研究，頁22。

肆、松滬會戰與抗戰精神動員

一、淞滬會戰的精神動員基礎—民族主義

淞滬戰役歷經三個月，其間國軍將士不畏敵人砲火猛烈，前仆後繼，致使傷亡慘重。淞滬戰役期間，陣亡最高階級是67軍軍長吳克仁，師長一名145師饒國華師長，副師長1員，旅長10員團長14員……⁷⁸這些陣亡將士，每一位都是民族英雄，值得後人無限懷念。何以當年國軍將士會產生一股視死如歸的精神去拼搏來犯的日軍？事實上，當年蔣委員長在廬山宣言中，突出了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手法，讓全國人民不分黨派地域團結起來共同抗日。當年的中國民眾對於國家的觀念仍嫌不足。已故的歷史學者黃仁宇教授，畢業於黃埔軍校14期，曾親歷抗戰，他對民國初年中國軍閥割據的現象有獨到的觀察：「民國初年之軍閥割據，實為歷史發展之必然後果。舊社會依賴『尊卑、男女、長幼』之順序，靠昊天誥命的皇權支持。又以科舉取士，用師云子曰不離口的學究作廟堂間與農村中的聯繫。然則科舉已在1905年停止，皇權又被辛亥革命推翻，那麼中國靠什麼存在？」⁷⁹顯然要以「國家」為團結全國人民的基礎，在當年是有困難的。廬山談話中以另一個意識型態來包裹國家，那就是民族主義。在〈最後關頭〉演說中，蔣委員長提到：「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

，所以不可以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⁸⁰

蔣委員長的不能僅從宣言而來，還必須以實際行動取信於當年各地區的軍事強人。因此，黃仁宇教授強調：「在淞滬戰役期間，最先只有將「嫡系」部隊不惜投入戰場，包括德式裝備各師及機械化部隊已是如此，此外教導總隊原為籌設新軍而設，數千人全部新式裝備，而且其人員經過及嚴格的遴選，所有士兵身材限於一定高度，全總隊經過嚴格訓練，以便為示範及儲備為下士官之用，並未來日各軍師標準化之基礎。此時亦毫無棧戀，立即耗用於淞滬及南京戰場，以致於無法恢復。」⁸¹也就是說，當年國民政府以民族主義為號召，以淞滬戰役為手段，作為精神動員的基礎。這也回答了某些治史者的評論。這些治史者認為，把龐大的精銳犧牲於狹隘的淞滬戰場上，是不值得的。但如果當年中央軍不勇猛投入戰場，其他地方軍事強人豈會信服一紙宣言？以戰役本身當作精神動員的手段（或管道）實在是不得已之舉。

儘管中央軍犧牲了絕大部分，但卻換來了地方軍事強人的支持。例如原屬桂系的李宗仁將軍的回憶中提到了：「盧溝橋事變後的4、5日，蔣先生即自廬山拍電來桂林，聲言中央以決心抗戰，約白崇禧和我速赴廬山，共商大計

78 黎東方，〈淞滬會戰〉，《傳記文學》（台北：第41卷第3期，1982年9月），頁64-65。

79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1月），頁34。

80 蔣中正，〈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頁3。

81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186。



。我們接電後，不假深思，便覆蔣先生一電說，中央既已決心抗戰，我輩誓當擁護到底，崇禱當即遵命首途，聽後差遣：我本人則暫留桂林，籌畫全省動員事宜，一俟稍有頭緒，亦即兼程北上共效趨馳。」⁸²最後事實證明，許多地方軍事強人他們放棄了一己之私，願意以民族為念，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的政府組織中，共同為抗戰效忠。

二、抗戰精神動員的管道

抗戰爆發前，我國並未以日本為特定對象進行精神動員，因此廬溝橋事件後，對於日本到底是戰還是和，在政府內部有不同的意見。主和論者以戰備未充，必至戰敗，且將淪入中、俄共的陷阱；主戰論者則以退無可退，戰未必敗，聯共抗日，可得俄援，甚至俄必參戰，日亦敗滅。⁸³主和者如徐永昌，他在至何應欽的書信中寫道：

今肯定我國果以及時抗戰為利乎？抑或最小限，尚須一年或半年之準備較有利乎？若及時抗戰為利無論矣，倘尚須一年或半年之準備，則此時以努力忍耐為宜。順日武官之緒而尋之，亦未始非計。果能維持和平以達我由忍耐求準備之目的，我故有利；即無結果，我又何嘗不可。以求和平不得，益重日人之暴，而博世界之同情耶！⁸⁴

另外，當年胡適及其他的社會賢達亦有贊同此議者，因為此議也有理論基礎。

蔣緯國將軍提到⁸⁵：

在陸軍整軍方面，另外有一項不為外人瞭解的狀況，亦即當時德國曾答允蔣委員長，協助我國整建80個師，除以德國最新武器裝備外，並派遣顧問協助訓練，區分兩個階段實施，每一個階段整建40個師，預定民國27年底完成，可惜此一計畫被另一國偵知，基於其本國基本利益，出面阻撓而作罷！後來蔣委員長曾經私下表示，如果此一計畫完成，日本在民國27年底前仍不發動全面侵略，我國就將以新整建的兵力，於民國29年收復東北失土。

還原當年的情景，無論是戰是和，都關係到國家生存與民眾生活，不是少數人的決定可以定奪的。蔣委員長於26年7月15日開始，以非正式的「牯嶺茶話會」與社會人士溝通，後來更在國民政府中設置「國民參政會」，為的是將精神動員管道建立起來，凝聚全國的向心，將全國抗戰的民氣聚集到最高點。但要凝聚民氣，集中意志，絕對不是幾篇演說就可以讓人民信服。陶希聖當年曾參與「牯嶺茶話會」，茶話會結束後，與會人士對於委員長的和戰決策仍有懷疑，他提到：

為什麼我們都懷疑是打還是和呢？因為委員長已經叫宋明軒（宋哲元）回北平去，好像是要談；而且我們家裡都在北平，學校也在北平，在牯嶺開完會後，究竟回不回的去？所以大家議論紛紛。

82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451。

83 蔣永敬，《抗戰史論》（台北：東大出版社，1995年10月），頁280。

8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徐永昌致何應欽函一件〉，《民國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87年11月，第10期），頁53。

85 蔣緯國，《抗日戰爭指導》（台北：遠流圖書公司，1989年4月），頁265。

抗戰的和戰大計除了要與意見領袖溝通外，抗戰時期我國處於訓政階段，缺少民主議會，人民與政府的意見交流管道缺乏，社會賢達又是少數中的少數，人民是否支持全面抗戰，是當年執政者的考量要素。日後檢視歷史資料，蔣委員長早已決定對日作戰，但如果能夠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勢必讓這場衛國之戰的層次拉高，讓人民休戚與共。同時若能引進外援協助抗戰，將可得到更大的效果。

前章討論精神動員管道時，曾經提到精神動員的作為是以戰時或非常事變時支援其他動員事項為主，精神動員的溝通以垂直管道為主，平行管道為輔；其溝通網路以鏈型為主，其他為輔，藉以達到迅速發揮動員效果之境界。睽諸滬戰期間，國內缺乏一條鞭式的垂直管道，更遑論其他管道，因此必須採行特殊的精神動員傳輸管道，發動一場會戰，作為精神動員管道的方式。這也就是本文的第二個核心觀點：以戰爭本體作為精神動員管道。就主觀而言，當年蔣委員長下達抗戰決心，面臨的困難很多，陶希聖曾經問過委員長的首席幕僚陳布雷，陳提到了蔣委員長的想

南京時期，我們曾至陳布雷在頤和路4號的寓所，請教他這個仗打得打不得，陳布雷為我們解說：「委員長是把精神動員起來，用精神總動員的力量來支持軍事力量，因為單憑軍事力量很難對付日本。委員長不求一個一個戰鬥的勝利，而是總體的戰爭，來求得最後的勝利。」⁸⁶

就客觀的角度而言，淞滬會戰也的確達到了精神動員的效果。2000年前後，德國檔案局解密了一些1930年代的軍事機密文件，其中包含了淞滬會戰後，德國駐華軍事顧問所撰擬的「上海戰役報告」，上呈德國陸軍總部。這些由第三方專家所寫的觀察報告，對於淞滬戰役的效果有著以下的描述：

打了三個月的上海戰役，雖然遭受無數的挫敗，卻產生一部非常光榮的歷史，中國軍隊的英勇戰鬥與不計任何犧牲代價的精神，為中外人士所敬佩。⁸⁷

不論從主觀意志與客觀事實的角度，都顯示淞滬會戰作為精神動員的管道已經成功。因為這場戰役將全國人民的抗戰意志完全激發。雖然戰役的結果不如預期，但已經為後續的精神動員奠下深厚的基礎。

三、淞滬戰爭期間的中外宣傳—八百壯士

淞滬戰役爆發後，全世界將焦點置於中國。特別是在上海彈丸之地，國軍以劣勢裝備抵擋日軍長達3個月之譜，徹底粉碎日軍「三月亡華」之狂傲心態。淞滬戰役本身即具有宣傳的效果。淞滬戰役的高潮是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這些88師524團第1營全體官兵，在團附謝晉元中校的帶領下，進入88師的師指揮所—四行倉庫，孫元良將軍回憶「我向他們說：『你們最好把指揮所和核心部隊位置放在這裡。這幢龐大的建築物，不只堅固易於防守，同時更易於掌握部隊，我們的新兵實在太多哪，這裡

86 陶希聖，《陶希聖先生訪問記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6月），頁64。

87 傅寶真譯，〈德國『上海戰役』檔案資料〉，《軍事史評論》（台北：1998年6月，第5期），頁250。



糧彈存儲很多，為防止自來水管被截斷，飲水也由存儲，有這樣好的根據地，你們可以堅持下去，好好的打仗了。』」⁸⁸同時88師的參謀長張柏亭也提到當時向第3戰區顧祝同將軍面報的景況：

顧：前略……國際聯盟11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會中接受我國控訴，將來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為，所以委員長有意要貴師繼續留在閘北作戰，把一連一排一班分散，守備市區堅固建築物及郊區大小村落，寸土必爭要敵人付出血的代價，並相機游擊，盡量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

張：統帥的決定，當然絕對支持；不過就任務遂行的效果，有些意見孫師長要我來向您面報。⁸⁹

（中略）

顧：那麼你們準備怎麼樣來實踐委員長的意見？

張：部下的想法，委員長訓示是政略目的，是要強調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為，上海市一個國際都市，中外視聽所集，要在國聯開會時，把淞滬戰場的現實景況，帶到會場去。既然如此，似乎不必要硬性的規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種方式，儘可能授權擔任部隊，斟酌戰場實際狀況，來做適當的措施。

顧：孫師長電話中，也曾提到這些，但沒有說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和守備何種據點。

張：部下認為選拔一支精銳部隊，至多一團左右兵力，來固守一二個據點，也就夠了。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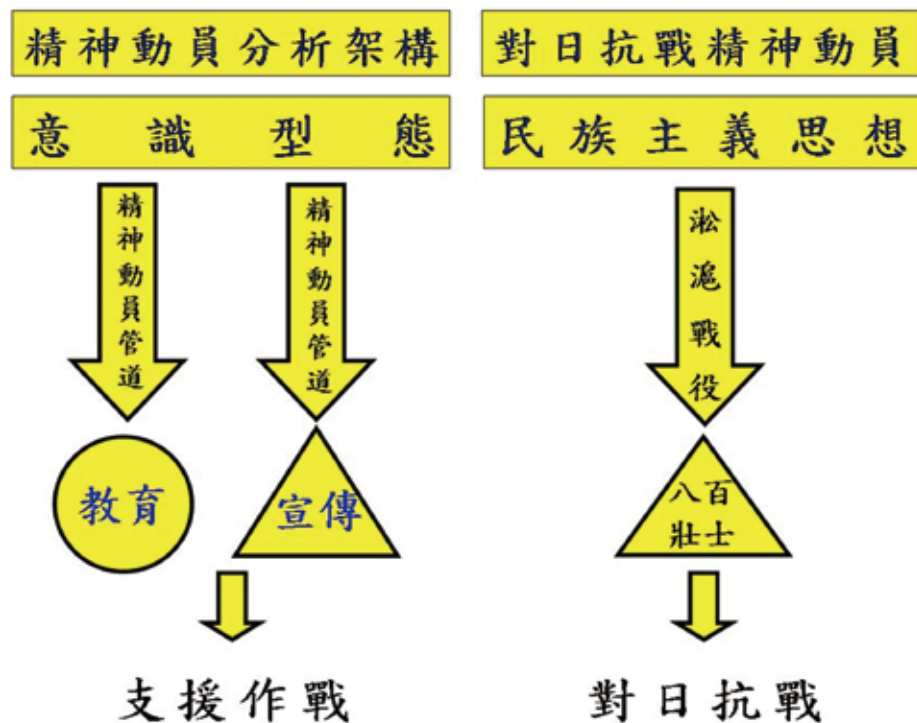
張柏亭參謀長回去和孫師長商討後決定以一個加強營的兵力留置四行倉庫，與日軍周旋。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故事傳遍海內外，上海市民對於守軍的支持是最直接且有效的。孫元良提到：「物質的支援，從食物，日用品，到土木作業工具，無所不有（最合用而消耗最多的麻袋簡直不虞匱乏）自秋天轉入冬天，婦女同胞縫製的棉衣大批送到前線來，戰士的身心都溫暖了。三個月的戰爭中，每一個市民同胞和前線戰士息息相關，休戚與共。這就是全民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受到我全民的抵抗。」⁹¹八百壯士在四行倉庫死守了4天，由於友邦人士與國際輿論的同情，呈請我最高當局將524團第1營官兵撤離至安全地帶，張柏亭參謀長與上海市長俞鴻鈞、公共租界英國駐軍司令Smoolet共同會商八百壯士撤守計畫。最後決定將該營撤至英國租界內，此計畫並由英軍全權負責警戒，於夜間破壞日軍照明設備，英軍司令Smoolet親自佇立蘇州河上之垃圾橋頭指揮撤離行動。國軍四行倉庫的事蹟，已然成為世界報導的焦點，儘管當年中華民國獨立抗戰，卻由淞滬戰役後，國家的整體形象有所改善，世界上友我的聲音亦逐漸發揮影響力，八百壯士的事蹟已成為國際宣傳的最佳手段。

88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台北：時英出版社，2008年7月），頁222-223。

89 此時（26年10月26日）88師孫元良師長接獲顧副總司令電話，詢問全師死守之意見，孫師長的意見具申因電話不能詳述而派參謀長前往長官部面陳。

90 張柏亭，黎東方註〈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頁22-23。

91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頁210-211。



伍、結論

世界上的戰爭從來沒有停過，但是世人所熟知的卻不多。淞滬戰役是抗日戰爭的緒戰。雖然在戰場上我軍前後使用的兵力共為59個師，8個獨立旅，此外尚有地方部隊及砲、工兵等特種部隊，共約70萬人。⁹²仍然無法抵擋日軍20萬人的攻勢，但在精神動員的目的上，卻以大大喚醒了全國軍民同胞的抗戰情緒。淞滬戰役本身隱含著民族主義的情緒，藉由淞滬戰役的犧牲，讓全國地方軍事實力領袖團結一起共禦外侮，同時以國軍將士面對日寇的英勇犧牲，喚起全世界正義支持的聲音。淞滬戰役其實是當年我國缺乏資源下的精神動員措施，代價雖然慘重，可卻也支撐了全國民眾的民心士

氣，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在當年現代化程度甚差的我國，以此種不的不然的手段作為精神動員，後世的子孫更英緬懷先人的血汗功績，讓和平永保國家。

作者簡介

祁志榮博士

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系81年班
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88年班
政治作戰學院博士班96年班
現職後備動員管理學校中校教官，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92 顧祝同，《墨三九自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12月），頁170-171。